

中國文學史稿



中国文学史稿

二

(征求意见稿)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九二〇九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警卫营 编著

辽宁大学中文系七三年级
工农兵学员

目 录

第四章 隋唐文学

第一节	隋唐社会与文学概况·····	1
第二节	隋唐民间歌谣·····	9
第三节	唐代古文运动·····	20
第四节	新乐府运动·····	35
第五节	唐代传奇小说·····	63
第六节	李 白·····	71
第七节	杜 甫·····	87
第八节	韩愈批判·····	103
第九节	白居易·····	117
第十节	刘禹锡·····	128
第十一节	柳宗元·····	144
第十二节	李 贺·····	160
第十三节	李商隐·····	171

第五章 宋代文学

第一节	宋代社会与文学概况·····	179
第二节	宋代民歌、民谣和民间词·····	194
第三节	变法斗争在北宋文学中的反映·····	200
第四节	南宋诗词中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	214

第五节	宋话本.....	230
第六节	范仲淹.....	239
第七节	王安石.....	253
第八节	苏轼批判.....	278
第九节	陆 游.....	294
第十节	辛弃疾.....	308
第十一节	陈 亮.....	320

第四章 隋唐文学

第一节 隋唐社会与文学概况

一 社会概况

公元五八一年，杨坚夺取了北周的政权，建立起隋朝。又在公元五八九年灭亡了南陈后，结束了西晋以来将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实现了全国的统一。隋文帝顺应历史发展，又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建立新的制度，从而出现了全国形势基本稳定，社会转向繁荣的新局面。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继位以后，无止境地施行暴政。他的奢侈生活和残暴统治迫使人民无法再生活下去，终于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隋王朝的统治，于公元六一八年在农民大起义的烽火中结束了。

唐（618—907）是隋朝世族大地主李渊、李世民父子夺取隋末农民起义的胜利成果建立起来的新王朝。在起义战争中农民怀着对地主阶级的深仇大恨，镇压了大批地主和封建官僚，夺取了土地，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的基础；但反过来地主阶级对起义农民的残酷镇压、野蛮屠杀，使劳动力锐减，土地荒芜，严重地摧残了社会生产力，致使唐初，全国到处呈现出一片“城邑萧杀”的破坏景象。唐前期的主要统治者李世民、武则天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推行了一条进步革新的法家政治路线，使社会在近百年间处于相对统一、稳定的状

态，为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必要条件。他们的法家政治路线主要表现在：

（一）实行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的统一。附合李渊起兵的隋朝世族大地主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极力主张复辟分封制，他们是唐前期的主要分裂势力。当时大臣、隋旧贵族萧瑀胡说：秦实行郡县制“二世而亡”，“封建之法，实可遵行”（《新唐书·萧瑀传》），中书侍郎颜师古也说：“磐石之基，实资藩屏。”（颜师古《论封建表》）为了牵制唐中央力量，保持地方割据势力，他们对当时经常骚扰内地的，居住在中国西北一带有浓厚奴隶制残余的突厥贵族军事政权采取妥协、投降的不抵抗政策，有人甚至与之勾结，策动大规模武装暴乱。李世民、武则天和魏征等法家人物坚决抵制了这种倒行逆施，实行了郡县制，加强战备，练兵习武，大搞屯田，先后出兵消灭了东、西突厥贵族军事政权，镇压了策动叛乱的徐敬业、李贞、李冲等，捍卫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统一。

（二）以中小地主阶级做为唐政权的统治基础。经过隋末农民战争，李渊、李世民建立起代表庶族地主利益的李唐王朝。当时李世民认识到唯有依靠占地主阶级大多数的中小地主，才能在政治和经济上战胜几百年来形成的世族大地主势力的反抗，建立较稳固的封建政权。因此李世民积极扶植中小地主势力。而出身“寒微”的武则天，就更是如此。他们先后两次修订“氏族志”，在科举方面采取自举、试官、武举、殿试、女科等措施，为中小地主进入各级政权广开了门路，大大提高了中小地主的社会地位，扩大了唐政权的统治基础。为粉碎新旧贵族对上述措施的反抗，李世民于六二

七年发动“玄武门之变”，杀了腐朽势力的代表李建成、李元吉等，逼李渊退位，夺取了最高统治权力。武则天更是果断、刚毅地使用暴力措施，先后杀逐了包括自己亲生儿子李弘、李贤，皇亲国舅长孙无忌在内的新旧贵族反对派几千人；大张旗鼓地号召检举“谋反”者，严厉警告新旧贵族不得互相勾结，有力地巩固了唐前期以中小地主为主体的封建政权。

（三）按照“中国既安，小夷自服”的原则，实行抵抗侵扰，及与国内各民族和邻国和睦相处的对内对外政策。他们力求避免或减少对外战争，节约政府开支，增强国力，防止阶级矛盾激化。

（四）实行“均田法和府兵制”。颁行以人丁为本的“均田法”、“租庸调法”和“府兵制”，变隋朝依附性很强的部曲荫户制为客户佃耕制，变代役租为实物租。这样既解决了政府赋税来源，也有利于政府、中小地主向豪强大地主争夺劳动力。在客观上，避免了平时养大批军队，同农业争夺劳动力的矛盾，使农民获得较大的人身自由，相对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于恢复和发展生产力是有好处的。

（五）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坚持尊法反儒。李世民“之罘思汉帝，碣石思秦皇”（《春日望海》）；李治（高宗）“薄于儒术，尤重文史”；武则天“素多智计，兼涉文史”。这些皇帝都具有明显的尊法反儒倾向。他们在科举制度上重进士，轻明经；考试时重视文史和诗赋文学；另外又提倡佛教，排斥儒学。当时，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无不以文章达”，“时俗浸轻儒学，先王之道弛废不讲。”结果涌现出一批象刘知几、李百药、吕才这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尊法反儒的地

主阶级思想家，使法家思想在当时占了上风。

因此，唐前期社会相对安定，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国际友好往来，物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当时印度的佛教，西域和阿拉伯的音乐、舞蹈和艺术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而当时中国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对世界，特别是对亚洲产生了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唐代是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向后期过渡的时期。这时，地主阶级的进步作用是有限的。到武则天执政末期和中宗时期，唐代经济已接近鼎盛时期，政治上的一些弊病也就开始显现出来。这表现在：政权机构中一些原来代表中小地主利益的人，由于自身经济、政治地位的变化，逐渐由要求革新进步变成反对变革、反对进步的保守势力的代表；大批商人与皇族勾结，出高价买官进入政权机构，这些主要以买卖奢侈品为业的商人具有极大的腐朽性；由于提倡佛教，社会上出现大批不事生产的僧侣地主，同时，修筑庙宇，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加重了人民负担；由于土地兼并，农民不断破产，“均田法”日渐失效。这些无疑都激化着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和守旧派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乃至爆发成对抗性的事变，则是在李隆基（玄宗）当政期间。

李隆基统治的后期，他已成为道地的腐朽势力的代表。对内，他宠信宦官，变中央集权为宦官专权，变依靠中小地主的政策为依靠豪强大地主；对外，他大开边战，欺压少数民族和弱小邻国，为此，他变“府兵制”为“募兵制”，设立节度使，使之率重兵常年居守重镇、边地。这样就使中央大权旁落，在地方上出现了大批握有重兵的军阀，战事频繁，军费开

支浩大，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锐起来，终于在天宝十八年（755）爆发了“安史之乱”。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把李唐王朝从它统治的最高峰上推了下来。

安史叛军的头子安禄山、史思明都是内附的胡人，是李隆基、大宦官高力士、官僚大地主宰相李林甫一手扶植起来的大军阀。经过十几年的酝酿，七五五年安禄山带十五万大军发动叛乱，直取长安。七五六年攻入长安，李隆基、高力士一伙仓惶出逃。唐朝同叛军经过八年的战争，不分高下。到七六三年，双方都已精疲力竭，需要有一个喘息时间，加之安、史两人已死，叛军分裂，无人统一，因此，双方互相妥协，叛军名义上承认是唐的臣属，朝廷允许叛军各部继续拥兵割据。从此，唐中、后期军阀割据状态形成，藩镇之间，中央同藩镇之间的战争起伏不绝。七八一年，河北三镇为向朝廷争取世袭传子制再度叛乱。七八〇年，朱泚率涇原譚变士兵占据长安，李适（德宗）只带少数家属逃走，几乎当了俘虏。直到八一九年（宪宗元和十四年），藩镇割据势力相继平定，唐王朝才实现了短暂的统一。

统治者为了争权夺利互相恶斗，给人民带来空前深重的灾难。统治者不仅自己烧、杀、掳、掠，为战胜对方，还以允许掠取财物和人口为条件，向少数民族统治者借兵，因此使社会生产力遭到难以想象的破坏。仅人口一项，就由七五四年的五千二百八十八万锐减到不足两千万。人口少了，赋税却有增无减。统治者为了应付扶摇直上的军费开支，在七八〇年颁行的“两税法”中就规定了“量出制入”，即无限制地向人民搜刮。贫苦农民为躲避战祸和苛捐杂税纷纷逃亡，依附豪强地主，重新沦为“荫户”。而豪强地主则趁机抢占

民田，土地兼并不可扼制地发展起来。安史之乱后，黄河流域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朝廷的赋税主要取自江淮地区，所以这里的人民受压迫倍加惨重。七六二年，袁晁在台州发动农民起义，登高一呼，“疲于赋敛者多归之”（《资治通鉴》），不久就发展到二十万人，这足以说明当时阶级矛盾之尖锐。

随着反动统治者压迫的加重，掠夺对象也扩大了，以至危及到中小地主。八〇五年，唐中央出现了以王叔文为首的革新集团发动的意在挽救李唐王朝危机维护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革新运动。这就是“二王革新运动”。革新集团在李诵（顺宗）支持下，提出“内抑宦官，外制藩镇，摄天下财富、兵力归之于朝廷”的施政方针，同时又施行了一些进步措施：贬逐贪官李实，起用具有进步倾向的陆贽，撤换盐铁转运使李錡，向宦官夺兵权，减免苛捐杂税，罢宫市，放还宫女等。这些措施打击了宦官和藩镇势力的嚣张气焰，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在以大宦官俱文珍、大军阀韦皋为首的反动势力围攻下，这次革新仅维持七个月便失败了。革新集团主要成员王叔文被诛，王伾被逼死，刘禹锡、柳宗元等被流放到边远地区。这个事实说明，唐王朝已经病入膏肓，决非地主阶级自己所能战胜。

这个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孔孟儒学占据压倒优势。李隆基追谥孔丘为“文宣王”，追封孔丘弟子为“公、侯、伯”，亲自到曲阜朝圣祭孔，並亲注《孝经》颁发全国、一时尊孔妖风甚嚣尘上。儒法两家围绕是统一还是分裂，是法先王还是法后王，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法家文学家、思想家刘禹锡、柳宗元站在进步

革新的立场上，以无畏的斗争精神，写下了许多战斗性很强的政论文，有力地批判了当时以反动儒生韩愈为代表的守旧腐朽势力散布的分裂、倒退等唯心主义谬论，其中刘禹锡的《天说》、柳宗元的《封建论》是最为突出的两篇代表作。

自八二〇年宪宗为宦官所杀，唐政权便在宦官操纵下江河日下。这时，社会上藩镇林立，朝廷内是朋党相争，边境上少数民族军事集团不断侵扰。封建社会的各种基本矛盾都达到表面化、白热化的程度。唐王朝这只“纸船”只待农民起义的“明烛”把它烧掉了。

在经过裘甫、庞勋等领导的十几次局部的农民起义后，八七四年爆发了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大起义。起义农民响亮地提出“冲天”、“均平”的革命口号，所到之处，杀贪官，平藩镇，夺取土地，焚毁儒家经典，直至攻占长安，建立“大齐”农民革命政权。这次起义共持续了十一年，才被地主阶级残酷地镇压下去。

这次农民大起义虽然没有直接推翻唐王朝，但却是唐王朝灭亡的最主要原因。反动文人韦庄描写起义军攻入长安的情景：“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从反面说明了起义对唐政权的沉重打击。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但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发展起来的军阀遍及各地，从此无法收拾。他们为了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各自与朝廷上的朋党相勾结，互相攻伐，朝官的擢贬，如同走马灯。唐王朝所能控制的地盘，仅存河西、山南、剑南、岭南四道，“王业于是荡然”（《旧唐书·僖宗纪》），名存实亡了。面对唐王朝的危亡，唐昭宗时的宰相李磎写了《反五等六代论》。这篇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战斗檄文，一时激荡了进步势力

受压抑、万马齐喑的气氛。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唐王朝的危局已不可挽救。九〇七年，靠叛变投敌起家的起义军叛徒、大军阀朱温废掉唐昭宣帝李祝，唐王朝宣告灭亡，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的大分裂时期。

二 文学概况

唐代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个时期的文学斗争相当激烈，进步的文学取得了辉煌成就。

唐代文学是伴随着阶级斗争和地主阶级内部儒法两条路线斗争而发展的。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的激烈程度往往影响着文学斗争和发展的趋势。唐代前期，阶级斗争暂时缓和，法家路线在唐王朝佔优势，在这个时期里，有一些巩固政权的诗歌出现，但是六朝的消极遁世和形式主义的时歌仍然存在着余绪。唐代文学开始了显著的变化，是在安史之乱前夕。这时的阶级斗争转趋激烈，朝政黑暗，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作家勇于揭露现实中的矛盾。他们的优秀诗篇成为唐代中叶文学大发展的先导。安史之乱和其后长期藩镇割据的中唐，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儒法两条路线斗争达到极为尖锐的程度，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唐王朝不断出现政治危机，基于这种形势出现了“二王革新运动”，适应这种政治革新，在文学方面，涌现了大批进步的文学家，出现了诗文革新运动——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这两个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多数是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他们的诗文敢于广泛地揭露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黑暗现实，矛头指向腐朽的贵族统治，有的宣传了尊法反儒的思想，而且系统地提出了进步的文学理论指导这一运动，有力地打击了浮靡淫艳、复古倒退

的文风。这个时期是唐代进步文学的繁荣阶段。晚唐进步文学在农民起义的大烽火中仍有一定发展，一些诗歌和小品文深刻地反映了现实，成为时代的记录。

从文体来说，诗歌在唐代有很大发展，六朝以来孕育的格律诗（五、七言绝句、律诗）的形式已经成熟，广泛为诗人所运用，但是很多进步诗人反对受格律的严格限制，创作了很多寄以新意的拟乐府和新体乐府，适应反映现实，表达进步思想的需要。这种诗歌自由化的倾向是这一时期作家文艺思想进步的标帜之一。短篇小说在中唐时代已经成熟了，这就是在六朝志怪小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奇小说。其中优秀的作品在情节描写、人物刻画、场面铺叙上都趋于完美，成为一种新的战斗的文学武器。在民间歌词的影响下，文人创作的词也在孕育着，这成为宋词的先声。总的来说，唐代文学的艺术技巧比前代有极为明显的提高，从而丰富了我国古代的艺术宝库。

第二节 隋唐民间歌谣

一 隋唐民间歌谣概况

隋唐的文学艺术是我国文学艺术发展史上兴盛繁荣时期，其中唐代诗歌成就尤为突出。

一定的文化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被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在隋末农民起义的推动下，经过各族劳动人民的长期努力，唐代前期封建中央集权空前统一，唐初统治者在政治上推行了顺应历史发展的法家路线，生产力提高，经济发展；安史之乱以后，出现了分裂割据形势，社会

经济江河日下；到了晚唐封建政治更加衰败。伴随唐代这一发展的趋势，广大人民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创造的民间文学在唐代是盛行的，“行人南北尽歌谣”（《敦煌曲子词》），“人来人去唱歌行”（刘禹锡《竹枝词》），由此可见当时的民间歌谣流传十分广泛。

在阶级社里，从来的文化都是有它的鲜明的阶级性的。从隋唐民间诗歌和歌谣中所反映的内容来看，恰是广大人民对统治者的最强烈、最深刻的反抗精神，它浓烈地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反映了人民要求改革现实的迫切愿望。因此，统治者一旦发现有人主动传播时，就会把他当做万恶的罪人。例如在唐中期有一个文人，在“武后长寿元年民谣”后面续了“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二句，就被御史纪先知所擒，劾其诽谤之罪。据《全唐文·唐僖宗南郊敕文》记载，统治者对民间流传的民谣曾这样说道：“近日奸险之徒，多造无名之状，或张悬文榜，或撰造童谣，此为弊源，合处极法”。禁止人民议论时政，要人民封住咀巴，“白日无谈人，谈人则害生；昏夜无谈鬼，谈鬼则怪至。”（《唐代俗谚》）这些都充分说明阶级矛盾，促使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不断地强化对广大人民的反革命“文化专政”。这是唐代民间文学作品很少保存下来的原因。另一方面反动御用文人对民间诗歌、谣谚还进行诋毁和篡改，用鱼目混珠的方法为地主阶级政治路线服务。如《唐中和童谣》：“黄巢走，泰山东，死在翁家翁。”

（见《新唐书·五行志》）再如《唐宪宗时童谣》：“绯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这类童谣在《洪范·五行传》中称之为“诗妖”，所谓“诗妖”据五行家的说法，是一种天机预告，多数产生于社会上出现了违反封建伦理道德

的“悖逆”现象时候。这类谣谚把农民阶级对统治阶级的反抗斗争说成不合天道，势不能长久，并污蔑为是暴虐行为，予示其恶果即将到来。显然，这是反动文人对民间文学采取的诋毁手段，正好证明其目的卑鄙。这一曲解是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宣扬孔孟之道的“天人感应”说，用来削弱人民斗志，为吃人的封建礼教效劳。然而，尽管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文化所进行的诋毁、摧残，劳动人民仍然大声疾呼，放声讴歌，用诗歌作武器向统治者进行英勇的斗争。

二 隋唐民间歌谣的思想内容

隋唐民间诗歌、谣谚所反映的思想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它所涉及到的阶级斗争的各个方面，对我们了解当时社会面貌，加深对封建社会中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认识，是一个很好的借鉴。《挽舟者歌》就是全面深刻地反映了在统治阶级的侵略战争和横征暴敛的重压之下，人民无比惨痛的生活。

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老。方今天下饥，路粮无些少。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寒骨枕沙荒，幽魂泣烟草。悲损门内妻，望断吾家老。安得义男儿，焚此无主尸。引其孤魂回，负其白骨归。

隋代统治者隋炀帝对外好大喜功，在大业三年到十年（607——614）就曾先后三次征伐辽东，最多曾发动上百万人出征。劳动人民被凶狠残暴的统治者驱赶着，受着饥

饿瘟疫折磨，很少人能活着回来，人民的骨髓都被统治者吸尽了。在国内他穷奢极欲，大造宫室，动辄使数百万人服劳役。这首《挽舟者歌》的作者是千百万受苦受难者中间的一个。尽管“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只剩下他能勉强供养一家老小，但是统治者还不甘心。作者沉痛地说：“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隋堤道就是一条绝路。他用全身的力量来挽龙舟，由于饥饿劳累，真是步步走向死亡。天下四方都处在饥饿之中，还要供给统治者穷奢极欲的享受，这些役夫怎么能吃饱呢？“前去三千程”，这样遥远的路程使他们无法活下去，只有死在隋堤之上。这首诗通过挽舟者一家的遭遇，典型地反映了隋代三十年的罪恶统治，给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它深刻地表现了当时的残酷阶级剥削和压迫，揭露了统治者的残暴和腐化。

在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隋朝大业年间，在山东长白山一带就活动着一支由王薄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有关这支起义军的事迹有一首《隋大业长白山谣》：

长白山前知世郎，纯著红罗绵背裆。长稍侵天半，
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
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诗中描写长白山前以王薄为首的农民起义英雄，穿着整齐的军服，手持着冲天的长矛，挥舞着战刀，在日光照耀下显示出雄姿威武和斗志昂扬！他们驻扎在山上，忽然听到统治者的军队来了，立即拿起武器勇敢地向前冲去，充分说明了农民

被统治阶级逼迫，走投无路，只有揭竿而起，同万恶的统治者做生死的斗争。这首诗反映了起义人民的英雄气概和奋勇杀敌的革命精神。全诗充满了农民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反映了人民坚定的胜利信心。隋朝统治政权在农民起义打击下垮台了，在我国历史上出现了唐朝。唐朝自玄宗执政以后一天天走向下坡路。他追封孔丘为“文宣王”，推行守旧倒退的儒家路线，终日不问国政，过着荒淫腐化的生活。

人民在歌谣中对最高统治者的这种昏庸腐败表示憎恨和嘲讽。如在《杨氏谣》中，人民对唐玄宗与杨贵妃的荒淫祸国曾经这样的表示不满：“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是门楣”。又如在《神鸡童谣》中，人民对玄宗荒唐的斗鸡走马生活，曾经这样讽刺道：“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因为玄宗喜欢斗鸡这种游戏，会斗鸡者由此能受到宠爱，以至全家都得到富贵。可见唐朝统治者生活享乐腐化达到什么程度。对于直接压在人民头上的贪官污吏，人民在歌谣中也以辛辣而形象的语言，揭露出他们的丑恶面貌：

前得尹佛子，后得王癩癩。判事驴咬瓜，唤人牛嚼沫。见钱满面喜，无镪从头喝。常逢饿夜叉，百姓不可活。

——《王法曹歌》

劳动人民的苦难都是这些贪得无厌、食人血肉的官吏们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类似这样的歌谣流传很多。如“宁食三斗蒜，不逢杨得干”。“宁向儋、崖、振、白，不事江、滕、蒋、虢”。还有《两京童谣》、《京洛语》、《选人歌》、《武后长寿元年民间谣》等也都是反映这一内容的。